

# 1928年蔣馮關係再探

王正華

## 摘要

繼徐州會議後，蔣中正和馮玉祥的關係日趨接近，1928年初蔣、馮展開新一階段的合作關係，共同進行北伐最後的軍事行動。北伐軍推進華北，要擊敗奉張，攻取北京，獨力難為，需要借重馮玉祥在北方的軍事力量，甚至要結合山西閻錫山；馮、閻也清楚必須和蔣合作，方有可為。因此蔣和馮、閻結盟，實基於北伐戰略上的需要，共同的利害。

本文探討北伐後期的蔣、馮關係，利用《蔣中正總統檔案》之〈事略稿本〉1928年1月至7月間兩人七次會面的紀錄，勾勒兩人關係發展的脈絡。2月16日開封軍事會議，確立蔣中正和馮玉祥與閻錫山合進北伐的軍事戰略，兩人並於鄭州結金蘭之交，強化戰略合作的意義。4月27日蘭封會議，商定對黃河以北作戰計畫。濟南事變後，蔣、馮5月5日會於黨家莊，共商應付危局，取得對日不抵抗的共識；19日鄭州之會議定會師京津總攻擊方策。至於京津接收的安排並取得馮對閻接收北京的諒解，兩人先後就商於道口和柳衛。

綜觀1928年北伐後期蔣中正和馮玉祥關係的轉折，濟南慘案是一關鍵，因濟案打破北伐的布局，張作霖發表和平通電，提前結束北京的統治，造成蔣、馮對奉張和平或用武的歧見；其後，蔣調解於馮、閻對北京接收的爭議。京津底定之後，7月1日的鄭州會面，沒有慶賀北伐勝利的喜悅，蔣、馮關係已漸行漸遠，來自國際的壓力，也來自內部的矛盾。

關鍵詞：蔣中正、馮玉祥、閻錫山、張作霖、濟南慘案

#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ang Kai-shek and Feng Yu-hsiang in 1928—A Revisit

Cheng-hua Wang\*

## Abstract

After the Hsuchou Conferenc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ang Kai-shek and Feng Yu-hsiang became gradually closer. In early 1928, the two started their cooperation, working together on the warfare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In order to push northward, defeat Chang Shueh-liang at Northeast, and take Peking, Chiang needed help from not only Feng Yu-hsiang but also Yen Hsi-shan at Shansi. Both Feng and Yen also knew very well that the cooperation with Chiang would benefit them too. In other words, the close ties among the three parties turned out to be a necessity in warfare and in mutual interests.

With the help of *The Chiang Kai-shek Collections: The Chronological Events of 1928*,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cords of the seven meetings between Chiang and Feng within the first seven month of 1928, delineating the developments of their cooperation and their friendship as well. In the meeting of February 16, the cooperation among the three was firmly established and their friendship consolidated. On April 27, the plans on waging wars in the areas northern of the Yellow River were decided. After the Jinan Incident, Chiang and Feng met at Tangchiachuan on May 5, discuss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and reaching the conclusion not to fight back. On May 19, they decided to gather their armies around Peking and Tianjin with certain attacking strategies. As to who and how to take Peking, the matters were discussed during the meetings at Taokou and Liuwei.

After a closer look at such developments, it is clear that the Jinan Incident was a turning point. Because of this incident,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underwent great changes. First, Chang Cho-lin announced a peace appeal and receded from his position as the government of Peking. This caused some disagreement between Chiang and Feng in terms of warring strategies. Finally, Chiang negotiated the conflicts between Feng and Yen as to the takeover of Peking. When Peking and Tianjin were taken, the Chenchou Conference did not celebrate the victory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instead, because of international pressures and internal conflicts, Chiang and Feng had but to loosen their ties.

**Key words:** Chiang Kai-shek, Feng Yu-hsiang, Yen Hsi-shan, Chang Cho-lin, Jinan Incident

---

\*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 1928年蔣馮關係再探\*

王正華\*\*

## 壹、前言

自1926年8月馮玉祥國民軍和中國國民黨完成合作辦法，馮五原誓師，響應國民革命軍北伐。北伐軍進入長江流域，馮軍也入河南。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和馮玉祥於1927年6月徐州之會，馮支持蔣和南京國民政府，決定後期北伐聯閻制奉的戰略，也加速武漢政府的瓦解。1928年1月蔣中正復職，展開北伐最後階段的軍事行動，從會攻魯冀，五三濟南慘案的發生，對奉政策的爭議，到底定京津的軍事行動，關涉國際的態度，均牽引蔣、馮關係的發展。

蔣中正和馮玉祥於1928年1月至7月間，共有七次會面，即2月開封之會，4月蘭封之會，5月黨家莊、鄭州、道口之會，6月柳衛之會，和7月鄭州之會。每次會面的原因為何？討論的要點為何？相較蔣中正與閻錫山一次石家莊之會，蔣對馮、閻二人有何不同的看法？

由於《蔣中正總統檔案》的開放，對於蔣中正的相關研究，提供寶貴的史料。北伐時期的重要議題，雖過去研究已多，但可據以重新檢視，深入幽微，開發新的研究趨向。〈事略稿本〉1928年部分，保留有關蔣中正和馮玉祥相交往的紀錄，甚為豐富，提供兩人關係的重要線索，無論是蔣、馮往來電文、面對面的討論或蔣個人對馮的看法，對北伐軍略、五三慘案後應付日本的辦法，對奉政策和京津接收，都可彌補過去研究之不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4年12月1日，通過刊登日期：2004年12月29日。

\* 國史館協修

足。<sup>1</sup>

本文以 1928 年蔣中正《事略稿本》為主軸，輔以《蔣中正總統檔案》之〈籌筆〉、〈特交文電〉、〈特交檔案〉，以及〈革命文獻〉所包括「第二期敵情概況與我軍戰略」、「進占武漢」、「寧漢分裂與北伐中挫」、「蔣總司令復職與軍事布置」、「會攻魯冀」、「濟南事變」、「底定京津」等案卷保留的兩人來往電文，參照馮玉祥的《日記》，探討蔣、馮二人在北伐後期互動關係的發展，對北伐後政局的影響。

## 貳、開封會議與金蘭訂盟

1928年1月蔣中正在各方熱烈的歡迎下回到南京，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當時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曾憂心總司令之職權能否統率各軍，西北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馮玉祥、北方革命總司令閻錫山雖擁蔣復出，但各有所圖，蔣心知「煥章雖包藏野心，百川雖意在割據」，但仍深具信心的認為「然在目前之趨勢，余必能使彼輩樂從我命也」。<sup>2</sup>北伐進展到黃河以北，必須和馮、閻切實合作，方有成功可能，蔣曾對朱培德表示：「吾必速籌北伐，願召馮、閻各軍，如此方能於政治上立定也。」<sup>3</sup>據前一年赴晉聯絡閻錫山的周震麟指出，馮玉祥「很容納中央意見，一致北伐，積極準備」，並請敦促閻一致討奉，服從中央。<sup>4</sup>北伐之進展視津浦作戰

- <sup>1</sup> 李國祁：〈北伐後期的政略〉，對蔣中正和馮玉祥黨家莊會商的詳情較略，李國祁：《民國史論集》（臺北：南天書局，民國79年2月）。劉鳳翰：〈馮玉祥與北伐〉，《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2期（民國86年5月），對接收京津問題討論不多。
- <sup>2</sup> 民國17年1月5日條，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民國16年9月至17年3月》（臺北：國史館，2003年7月），頁234。民國17年《事略稿本》，原名《民國十七年之蔣介石先生》，編者王宇高。
- <sup>3</sup> 民國17年1月13日條，王宇高、王宇正同編：《困勉記》，卷8，頁6，《蔣中正總統檔案》（以下簡稱《蔣檔》），國史館藏。
- <sup>4</sup> 「國民政府委員會第50次會議速記錄」（民國17年3月27日），〈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速記錄〉，第5卷，《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以下省略），檔號：0461/6077.03-05。

而定，若只以馮、閻兩方對奉，也未必有把握，非待蔣督師北進不可。<sup>5</sup>馮、閻也清楚和蔣合作，是唯一的出路，面對共同的敵人奉張，是蔣和馮、閻結盟的基礎。

早年孫中山友人馬伯援居間聯絡馮玉祥參加革命時，孫中山曾與之表示：馮玉祥「爲人過假，極靠不住，故吾同志中，均怕與彼往來。」<sup>6</sup>蔣中正基於北伐的戰略考量而和馮打交道，私下認爲馮「包藏野心」，實存在不信任感，但表面上要維持真誠的合作關係。

1927年以來，蔣、馮之間溝通的管道，有李烈鈞、黃郛、王正廷、方聲濤、孔祥熙等人穿梭其間，或獻議，或代爲傳話，或爲派駐代表，其中尤以曾任國民軍總參議的李烈鈞扮演重要角色。當寧漢僵持之際，蔣和馮之間電文往來透過李轉達，蔣甚至批示馮部來電交由李烈鈞覆；但自蔣中正下野，蔣、李之間芥蒂滋生。<sup>7</sup>是年12月，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在上海舉行預備會議，會中決議蔣中正續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但李烈鈞拒不與會。<sup>8</sup>此舉招致蔣的不滿，迨1928年1月初，蔣即認爲李烈鈞阻撓復職事，從中挑撥和馮的感情，且欲借馮自重，蔣認爲馮是好「猜忌」之輩，當北伐之際，不能任人中傷兩人關係，於是立請孔祥熙向馮轉達李烈鈞有挑撥之嫌。<sup>9</sup>馮玉祥得電表示不受人離間，強調當前最重要的事是與閻共

<sup>5</sup> 「國民政府委員會第39次會議速記錄」（民國17年2月17日），〈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速記錄〉，第4卷，《國民政府檔案》，檔號：0461/6077.03-04。

<sup>6</sup> 馬伯援：《我所知道的國民軍與國民黨合作史》，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3輯，總號27冊（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74年6月），頁29。

<sup>7</sup> 雷嘯岑：《三十年動亂中國》（臺北：古楓出版社，出版時間不詳），頁94-95。

<sup>8</sup> 洪喜美：《李烈鈞評傳》（臺北：國史館，民國83年6月），頁259-261。

<sup>9</sup> 在《事略稿本》民國17年1月13日條，蔣批評李烈鈞爲人「傲而且詐」，得確報李烈鈞「蓄意搗亂，屢向馮玉祥挑撥」。《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頁254-255。蔣中正致馮玉祥電指陳：「李協和近日仍暗中破壞進行，且挑撥馮與弟雙方感情，並聲言馮當發催復職電後，另有一電致寧局止發也。彼借馮之名以自重，政府諸人對馮反不便主張也。」「蔣中正致孔祥熙元電」（南京，民國17年1月13日），〈革命文獻—15蔣總司令復職與軍事布置〉，《蔣檔》，國史館藏（以下省略），檔號：2020.10/4450.01-016/39。

同努力，消滅奉魯兩張，「至播弄之詞，當視同秋蟲，任其自噪自止」；<sup>10</sup>並言：「此後重要事項，逕行電示，彼此情愫，無有不達。」<sup>11</sup>蔣覆電表示：「茲承來電，具徵朗照無遺，深為黨國愉慰。此後一切，自當如尊指辦理。」<sup>12</sup>自此，蔣和馮直接電商諸事，不再經李烈鈞轉話。蔣對馮要更進一步「慰結其心」，又追加一電示意：「與我兄左提右挈，共完使命，以慰平生。」<sup>13</sup>從這件事可見蔣在人事操作上的手腕高明，不容任何阻力。李烈鈞是最早進行馮玉祥、閻錫山攜手合作之人，當4月北伐大軍展開攻勢，馮、閻合作北伐實現之際，蔣中正又希望李出任北伐軍參謀長，為李堅拒。<sup>14</sup>其後即由蔣主導馮、閻合作北伐的進行。

隨後馮玉祥催蔣中正速出兵津浦以解晉閻之圍，蔣中正則以馮、閻「尙未能翕然團結」，督勸馮玉祥出兵相援。<sup>15</sup>蔣要求財政部長宋子文速交付孔祥熙80萬元，轉發西北軍，<sup>16</sup>「勿使其心焦而生疑」。<sup>17</sup>當南京無法兌現時，孔祥熙特電蔣陳言：「當此奉方攻晉甚急，煥章正積極北進，圖解晉圍，若稍涉敷衍，深恐貽誤大局。且吾兄東山再起，對西北尤當特別接濟，樹威信而固團體。」<sup>18</sup>滿紙動人的文字，餉費才是固結馮玉祥最

<sup>10</sup> 「馮玉祥致蔣中正刪電」（新鄉，民國17年1月15日），〈革命文獻—15蔣總司令復職與軍事布置〉，《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16/44。

<sup>11</sup> 民國17年1月17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頁270。

<sup>12</sup> 民國17年1月17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頁270。

<sup>13</sup> 民國17年1月18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頁271。

<sup>14</sup> 洪喜美：《李烈鈞評傳》，頁225-226、264-265。雷嘯岑：《憂患餘生之自述》（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1年10月），頁71。

<sup>15</sup> 「馮玉祥呈蔣中正篠電」（新鄉，民國17年1月17日）、「蔣中正致馮玉祥馬電」（民國17年1月21日），〈特交檔案—一般資料〉，第29冊（民國17年1月），《蔣檔》。民國17年1月21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頁275-276。

<sup>16</sup> 「蔣中正電催宋子文速發西北軍所須八十萬元」（民國17年1月18日），〈籌筆—北伐時期〉，《蔣檔》，檔號：2010.10/4450.01-0010/24。

<sup>17</sup> 民國17年1月18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頁271。

<sup>18</sup> 宋子文因籌款無多，只允30萬，經孔祥熙曉以利害，勉強允50萬，馮駐寧方代表處具領時，財政部長張壽鏞只撥現款20萬，正月期票10萬。蔣中正批示：「請宋部長務於月內撥足80萬元。」見「孔祥熙呈蔣中正皓電」（上海，民國17年1月19日），〈革命文獻—16會攻魯冀〉，《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19/1。

重要的籌碼。

1928年1月18日，南京政治會議通過北伐全軍戰鬥序列，特任蔣中正為北伐全軍總司令，節制馮、閻各軍，為統一軍令的要適。<sup>19</sup>2月6日，中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通過「集中革命勢力限期北伐案」，責成軍事委員會和北伐全軍總司令統籌全局。7日，蔣、馮、閻均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暨常務委員，蔣為主席。<sup>20</sup>蔣隨即巡視津浦前線，親自部署北伐軍事。<sup>21</sup>

當前一年馮玉祥調停寧漢時，李烈鈞即建議蔣克復徐州之後，最好親往汴鄭答聘，和馮共商大計。<sup>22</sup>當北伐再度展開軍事行動前夕，蔣即從徐州親往開封和馮玉祥舉行軍事會議，繼徐州會議之後蔣、馮第二次會商。

2月16日，馮玉祥親至蘭封迎蔣中正到開封，歡迎大會之後，蔣與馮在省府召開北伐軍事會議，閻錫山亦派代表參加，這是一年前黃郛向蔣建議和馮、閻合作的具體實現。第二集團軍參謀長劉驥提出北伐三路作戰的方案：一沿黃河北岸攻濟南；一取道大名攻德州；一沿京漢線取石家莊，以與晉軍切實聯絡。又特別提到亟待補充的軍費餉項；蔣當即允諾願負責迅籌措軍費，補充軍實。是日晚，蔣、馮又行密商。<sup>23</sup>

翌日上午，蔣中正先檢閱駐開封軍隊，復瞻謁孔廟，往郊外視察農

<sup>19</sup> 民國17年1月18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頁271-272。「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125次會議速記錄」（民國17年1月18日），〈中央政治會議速記錄〉，《中央政治會議檔案》，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黨史館（以下簡稱黨史館）藏，檔號：00.1/110。

<sup>20</sup>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17年（1928）1至6月份》（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民國67年7月），頁195、204。

<sup>21</sup>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民國67年10月，未刊本），卷1，頁201。

<sup>22</sup> 「李烈鈞致蔣中正卅未電」（南京，民國16年7月30日），〈革命文獻—13寧漢分裂與北伐中挫（下）〉，《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14/71。

<sup>23</sup> 蔣馮開封會議列席者，有第二集團軍參謀長劉驥、閻錫山代表趙丕廉和朱振聲、第一集團軍總參議何成濬、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處長葛敬恩等。民國17年2月16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頁429-430。

村生活；下午赴鄭州，軍民開會歡迎，繼往郊外考察農村狀況。據《事略稿本》的記載：

馮玉祥終日隨行，懃懃懇懇，請與公為兄弟之盟。公[慨然言]曰：「吾人同力一志，為國為民，義同死生，情自兄弟，盟與不盟，其實一也[無大關係]。兄今欲盟，亦無不可，遂與為盟焉。馮氏大喜。<sup>24</sup>

從以上的記載，似乎兩人訂交是出於馮的主動，《困勉記》對訂交事略而不提，是否因兩人後來交惡，特別淡化這段關係。蔣、馮二人在鄭州共訂金蘭之交，是由隨行的馬福祥獻議。<sup>25</sup>馮玉祥方面的記述，《馮玉祥日記》從2月6日跳至26日，這關鍵的數日正好付之闕如。<sup>26</sup>然馮玉祥1937年發表的自傳《我的生活》，則言是蔣送給他譜帖，與其約為盟兄弟，「以示同心同德，生死相共之義」，懇摯之意深受感動，遂回具一帖。<sup>27</sup>馮、蔣互換的蘭譜係訂於2月18日，<sup>28</sup>蔣中正年42歲稱弟，帖文：「安危共仗，甘苦同嘗，海枯石爛，死生不渝。」馮玉祥年47歲為兄，帖文：「結盟真意，是為主義，碎屍萬段，在所不計。」<sup>29</sup>

蔣中正和馮玉祥結為異姓兄弟，基於利害實甚於情義，畢竟兩人關係更進一層，軍事合作上有進一步的進展。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建議劃一軍號，得馮玉祥贊同；閻錫山也同意晉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sup>30</sup>2月28

<sup>24</sup> 民國17年2月16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頁430-431。

<sup>25</sup> 當時在馮玉祥部任政治工作委員的簡又文親聞於馬福祥，蔣馮訂交是由其作媒，當時蔣中正頒發犒賞金大洋百萬元，簡又文得到十元。簡又文：《馮玉祥傳》，下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1年6月），頁310。

<sup>26</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1月）。

<sup>27</sup> 馮玉祥：《我的生活》（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591。

<sup>28</sup> 蔣是在1928年2月17日晚8時離開鄭州，馮玉祥送至開封，見《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頁431。翌日回途經歸德、碭山，檢閱馮部，晚抵徐州。民國17年2月18日條，王宇高、王宇正同編：《困勉記》，卷8，頁11。

<sup>29</sup> 陶英惠輯註：〈馮蔣書簡新編〉，《傳記文學》，73卷6期（民國87年12月號），影集之1。

<sup>30</sup> 民國17年2月26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頁447。

日，國民政府特任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sup>31</sup>

開封軍事會議，確立蔣與馮、閻的合作，第一、二、三集團軍聯合攻取魯冀，作戰方略是「聲西擊東」，即第二、三集團軍在京漢線取守勢，由馮軍佯攻，誘奉軍調精銳部隊於西方；而第一、二集團軍集中精銳，沿津浦線急攻山東，直取天津、北京。馮玉祥亦依計將總部於3月7日移駐豫北新鄉。<sup>32</sup>10日，蔣中正往訪西北軍將領張之江，囑其轉電馮玉祥，希合力先取山東，將以山東交馮整頓。<sup>33</sup>

對於馮部軍餉軍械的支援，蔣更不敢怠慢。馮玉祥3月10日電告蔣軍事業已完全待命，即可出動，呈請中央籌撥子彈至少三百萬粒。<sup>34</sup>蔣覆電表示：「子彈補充誠不容緩，弟已設法購備，會當有以報命。」<sup>35</sup>蔣並向馮部汲取練軍的經驗，1927年11月當蔣派在馮部代表方聲濤南歸時，特別向蔣推薦馮部的大刀隊。<sup>36</sup>故而蔣也添辦大刀隊，請馮代選大刀隊教師，揀選十二人來寧教授，並望隨帶大刀；同時電張群催購軍械，並速製手榴彈及開口馬刀與大刀各三千把。<sup>37</sup>蔣回到南京，立即派專人為馮設法購辦鋼藥材料，蒐羅黃色炸藥千餘磅。<sup>38</sup>

謀求與馮、閻的合作無間，一直是蔣中正努力的工作。蔣、馮訂盟

<sup>31</sup> 《國民政府公報》，第36期（民國17年2月），頁3。然據《事略稿本》的記載：2月28日，政治會議議決任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而統受蔣為北伐全軍總司令，指揮作戰。民國17年2月28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頁451。查第130次政治會議的紀錄，係於2月29日召開，並無此紀錄。

<sup>32</sup> 簡又文：《馮玉祥傳》，下冊，頁310。

<sup>33</sup> 民國17年3月10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頁502。

<sup>34</sup> 「馮玉祥致蔣中正蒸電」（新鄉，民國17年3月10日），〈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檔》，光碟檔號：080200，030卷，編號：08B-02320。

<sup>35</sup> 民國17年3月12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頁508。

<sup>36</sup> 民國16年11月15日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2冊，頁394。

<sup>37</sup> 民國17年3月16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頁524。

<sup>38</sup> 民國17年3月19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頁546。

後不久，馮玉祥即告蔣，奉張全力造謠，以離間蔣、閻、馮與桂系。蔣即回電云：

至若奉方挑撥以求和，自在意中。祇要我方內部團結，互信堅如金石，則彼自無法可來離間，即使以後對於各方有應用之策略，晉豫寧三方事先應互相通報妥商，如是，則於奉方單獨和戰之策略，弟敢深信，不特弟與兄無與奉兩立之餘地，即百川亦必如此。蓋革命共同之基點既定，則彼此翕然，必可無間矣。<sup>39</sup>

其後在重大的軍事戰略和政治外交的決定，蔣中正是儘量做到晉豫寧三方事先互相通報妥商。

### 叁、濟案前後與蘭封、黨家莊之會

1928年3月底山東戰事展開，在軍事調度方面，蔣中正以方振武、賀耀組二部歸馮玉祥指揮，俟第一線濟寧擊破，再歸第一集團軍節制；蔣並電何成濬對馮方態度須格外親和，萬不可有絲毫不滿之意，務以團結著想。<sup>40</sup>蔣3月31日抵徐州督師，北伐軍作戰部隊，第一集團軍29萬人，第二集團軍31萬人，第三集團軍15萬人。安國軍作戰部隊號稱60萬人。<sup>41</sup>

時蔣中正駐節徐州，馮玉祥總部在新鄉，相距過遠，聯絡上不便，馮應蔣的要求，移往蘭封。<sup>42</sup>蔣為請馮協攻濟南，特於4月27日由徐州親往蘭封與之面議。馮到野雞岡相迎，兩人對於黃河以北作戰計畫，山東省政府組織問題及請馮擔任指揮津浦前線各軍等事，均商得解決辦法。<sup>43</sup>當

<sup>39</sup> 民國17年2月25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頁443-444。

<sup>40</sup> 民國17年3月25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頁560-561。

<sup>41</sup> 民國17年3月31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頁579、581-582。

<sup>42</sup> 馮玉祥：《我的生活》，頁594。

<sup>43</sup> 民國17年4月27日，王宇高、王宇正同編：《困勉記》，卷9，頁9。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民國17年4月至7月》（臺北：國史館，2003年12月），頁268。

時決定濟南攻下後，彰德奉軍後退，即由馮至濟南，擔任津浦線之指揮，而以京漢線之指揮歸閻。<sup>44</sup>即京漢線指揮歸閻，是徵得馮的同意。

5月3日濟南慘案發生，蔣中正5日到黨家莊，馮玉祥來晤，共同商議對日辦法，外交部長黃郛和王正廷亦在坐。蔣認為「以國家民族大計先後緩急之理勢論之，應以先求國內之統一為宜」，決定暫主「忍耐」；<sup>45</sup>馮玉祥表示，若以革命軍人立場發言，應該主張不顧一切反擊日本，但為避免軍事衝突，也同意外交交涉比較妥穩。<sup>46</sup>這夜，蔣和馮等即在車站旁露營，繼續討論北伐的戰略。<sup>47</sup>翌日，蔣繼與馮玉祥長談，馮自述「少時失學，今乃勤以補拙」，蔣對馮的勤學精神表示欽佩。其後，兩人共赴張夏檢閱馮部，馮玉祥訓話時指出：「濟南之恥辱，非言可喻，而各軍不守紀律，不聽命令，戰勝而驕，氣蕩心懈，實足以招人來侮之機。事勢至此，乃使我蔣總司令一人負責，吾輩應自愧悔。」蔣中正訓話時期以臥薪嘗膽的決心雪此奇辱。<sup>48</sup>繼與將領坐談時，馮玉祥強調：「多難興邦」，蔣中正當此艱險情勢，亦祇有「忍辱當難」。<sup>49</sup>即在此時，蔣中正接到國民政府委員會5日召集的臨時緊急會議的決議，決定「各路大軍繼續攻擊前

<sup>44</sup> 「蔣中正致方本仁儉電」（徐州，民國17年4月28日），〈革命文獻—16會攻魯冀〉，《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19/78。

<sup>45</sup> 民國17年5月5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278-279。

<sup>46</sup> 民國17年5月5日馮玉祥日記記載：「下午一點，開車北上。二點半，抵黨家莊，往晤蔣總司令。六點，同蔣及王正廷、黃郛出門散步，並在車道西洼內會食。」很可惜沒有詳細的談話內容。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2冊，頁458。馮玉祥：《我的生活》，頁601。

<sup>47</sup> 馮玉祥：《我的生活》，頁601。

<sup>48</sup> 民國17年5月6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280。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2冊，頁458。是日馮日記記載如下：「十二點，返張夏，召曹、秦討論軍事。四點半，偕蔣赴麥田，與手槍隊、將校隊講話，吾謂日本田中，喪心病狂，出兵濟南，阻礙北伐，望澈底覺悟，共捍國難。蔣謂此次外侮，實由國勢不振，吾人苟能興邦，外侮自息云。」按《事略稿本》記載，馮、蔣對部隊講話是在上午。

<sup>49</sup> 民國17年5月5日條，王宇高、王宇正同編：《困勉記》，卷9，頁10。

進，務於最短期間完成北伐。」<sup>50</sup>蔣即與馮商定全部戰略，馮仍回京漢線指揮，蔣並告閻錫山津浦全線各軍擬請馮指揮。<sup>51</sup>

5月7日，蔣中正到泰安，得京漢線奉軍全部退卻磁州以南，晉軍克山陰的捷報，<sup>52</sup>決定國民革命軍第二期會戰計畫，以第二集團軍為主力軍，沿京漢線直搗北京。<sup>53</sup>9日，蔣中正再電告馮玉祥：「以後進取京津，全望京漢一線」，並請馮統一指揮第一集團軍渡河各部。<sup>54</sup>即以京津重任交付馮擔任。

黨家莊會議蔣、馮對濟案的反應取得共識，對日本忍讓。10日，譚延闓、張人傑、吳敬恆北上兗州，和蔣中正舉行會議，決定軍事上取暫不抵抗，繼續北伐為唯一方針。<sup>55</sup>蔣旋告馮玉祥與南京中央商決對策，對日暫取「不抵抗主義」，各部仍以積極北伐為原則。<sup>56</sup>這是對日本「不抵抗主義」的首次見諸文字，應該就是蔣、馮於黨家莊會商時所提出，電文中提到「正如兄意」，所以很可能是馮玉祥最先提出的主張。<sup>57</sup>

<sup>50</sup> 「國民政府秘書處抄送府會對日嚴重交涉濟案之決議致中央秘書處函」，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19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頁1293。

<sup>51</sup> 民國17年5月6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284-285。原稿上「馮氏仍回京漢線指揮」之下有「直攻北京」四字被劃去，當時是以馮玉祥擔任攻取北京的任務。

<sup>52</sup> 民國17年5月7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288。

<sup>53</sup> 「蔣中正致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虞丑電」（泰安，民國17年5月7日），〈革命文獻—03第二期敵情概況與我軍戰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17/88。

<sup>54</sup> 「蔣總司令致馮玉祥總司令告以譚延闓主席等到徐及以後作戰方針電」（民國17年5月9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1）》（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0年9月），頁139-140。

<sup>55</sup> 民國17年5月10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305。

<sup>56</sup> 「蔣中正電馮玉祥與譚吳諸公商決對日取不抵抗主義以積極北伐為原則」（民國17年5月11日），〈革命文獻—17濟南事變〉，《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0/39。民國17年5月11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310-311。

<sup>57</sup> 張玉法教授提出民國20年九一八以後蔣對日抱持的「不抵抗主義」，起源於濟案蔣中正和馮玉祥商量對日辦法時，似由馮玉祥提出。張玉法：〈蔣介石對日本兩次出兵山東之反應（1927-1928）〉，「蔣中正與近代中日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

蔣同時希望馮督促主力，與閻「協同猛追，速下北京，以挽危局。」<sup>58</sup>譚延闓與張、吳和蔣兗州會商時，也討論到攻取北京後的政治問題，蔣中正即表示須與馮、閻兩總司令商議方能決定。<sup>59</sup>其後，閻錫山出石家莊，蔣中正一方面致電請閻與馮「事事推誠」，並表示：「雪恥之方，惟有團結，同志消除私見，共赴國難。」<sup>60</sup>

究竟誰先入京津，攻取保定為關鍵，馮、閻暗中較勁。當4月第一集團軍和第二集團軍全線北上總攻擊時，第三集團軍按兵不動。馮部在京漢線河南彰德與奉軍激戰，電催閻速出兵東進石家莊，以斷奉軍後路，但閻托詞緩兵。馮部告急，蔣以晉豫唇齒相關急電閻出兵石家莊，閻非但不應，反建議馮抽調大軍轉向京漢線北進。5月1日，第一集團軍擊潰直魯軍，占山東省會濟南；第二集團軍亦擊敗奉軍張學良部，進克彰德。第三集團軍方於5月3日展開攻擊。9日，第三集團軍徐永昌部占領石家莊，沿京漢鐵路北攻；11日中路軍和南路軍會師定縣。而第二集團軍鄭大章部亦沿京漢路北上進抵石家莊南約五十公里的高邑。12日，第三集團軍攻占望都，進逼保定，和奉軍爆發方順橋會戰。馮軍不但不援，反而調鄭大章部南撤石家莊一帶，造成第三集團軍右翼的缺口。<sup>61</sup>馮玉祥和閻錫山兩軍競逐北京的態勢形成。

---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2004年11月）論文稿，頁43。

<sup>58</sup> 「蔣中正致馮玉祥真電」（兗州，民國17年5月11日），〈革命文獻—16會攻魯冀〉，《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19/97。

<sup>59</sup> 「國民政府委員會第63次會議速記錄」（民國17年5月15日），〈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速記錄〉，第7卷，《國民政府檔案》，檔號：0461/6077.03-07。

<sup>60</sup> 「閻錫山呈蔣中正佳申電」（太原，民國17年5月9日）、「蔣中正致閻錫山真電」（兗州，民國17年5月11日），〈革命文獻—16會攻魯冀〉，《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19/96。

<sup>61</sup> 簡筌簧：〈晉綏軍與國民革命軍北伐〉，《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2期（民國86年5月），頁234-237。

## 肆、鄭州會議與對奉政策的爭議

濟案後的北京局勢瞬息變化，張作霖5月9日發表息兵通電，如何應付奉張息兵主張，並立即面對接收京津的問題。國民政府委員會11日討論張電時，何應欽認為打東三省，即與日本戰，「既不能與日本打仗，而以武力解決東三省，不妨對張等以寬宏大度，給他一相當名義，使他退出關外，如此先把中國統一，合力對外」。李烈鈞也主張「對其所部准其退於熱河、灤河以北，不必迫之太甚，待到了北京，得了政治中心，其他問題自易解決」。南京中央最初的反應是「不必使張作霖為難」。<sup>62</sup>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12日聯席會議，雖以張電無誠意而暫置不理，惟對誠意來歸之奉軍將領，允其自新。<sup>63</sup>

蔣中正考慮應付奉張停戰通電的對策，戰略上順應其主張，可允其全部集結關外，一切國是俟國民會議解決。蔣指示負責與奉方聯絡的吳忠信：「我軍非克復京津，不能挽回國難；奉軍非退出關外，無以表其愛國誠意。」<sup>64</sup>同時也電告馮、閻：「此時惟有京漢線猛進，速克北京，則一切國是不難解決。」<sup>65</sup>

蔣中正主張奉軍和平出關，馮玉祥則有不同的看法，他電請政府「勿受所動，應貫徹初衷，至外交方面則加緊布置」。<sup>66</sup>馮認為：「此時賊勢已窮，我軍惟有各路猛攻，可得走狗而烹之也。」<sup>67</sup>馮玉祥對奉「根

<sup>62</sup> 「國民政府委員會第62次會議速記錄」（民國17年5月11日），〈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速記錄〉，第7卷，《國民政府檔案》，檔號：0461/6077.03-07。

<sup>63</sup> 民國17年5月12日條，《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17年（1928）1至6月份》，頁813-814。

<sup>64</sup> 民國17年5月12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322-324。

<sup>65</sup> 「蔣中正致馮玉祥、閻錫山文電」（兗州，民國17年5月12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2。

<sup>66</sup> 「國民政府委員會第63次會議速記錄」（民國17年5月15日），〈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速記錄〉，第7卷，《國民政府檔案》，檔號：0461/6077.03-07。

<sup>67</sup> 「馮玉祥復蔣中正元酉電」（民國17年5月13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

本殲滅之見」，蔣解釋自己的主張是「惟其內部將領不妨令其覺悟，以爲釜底抽薪之計。弟之所謂允其加入國民會議者，非指張逆本人也」。<sup>68</sup>蔣私下認爲馮不肯對奉軍放寬，必欲根本殲除，事實上既難辦到，又與中央之意旨不合，更使日本有可乘之機，實強人所難。<sup>69</sup>

旋蔣中正奉命回南京商決大計，將津浦線交由朱培德指揮，仍聽受馮之命令；<sup>70</sup>5月14日車抵臨城，考慮回南京反易爲日本直接要脅，不如在徐州暫駐，對馮和前方的聯絡亦較便利，即電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請決定對奉、對日之輕重先後，蔣提議如先對奉緩和，只要求其退出京津，並可允其高級將領如張學良等加入政府爲委員。<sup>71</sup>晚得報日方濟南停戰，決定攻擊天津各軍至馬廠停止候命。<sup>72</sup>

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則先於12日針對濟案發表談話，認爲北伐軍進逼京津，各國對於保護外僑事宜預爲準備，實有挑撥列強聯合出兵之意。<sup>73</sup>翌日，國民政府委員蔡元培、張人傑和外交部長黃郛聯名電蔣：(1)方振武和賀耀組部勿再逼近京津；(2)田中12日談話，對京津有對馮干涉意，應力勸馮將京津責任交閻。<sup>74</sup>濟案之後，第一集團軍已無法在河北的軍事行動與第二、第三集團軍並進，未來平津地區勢必成爲馮、閻相爭之地。<sup>75</sup>

京津接收的問題迫在眉睫，早在1926年8月間馮玉祥和國民黨達成

---

《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3。

<sup>68</sup> 「蔣中正致馮玉祥元電」（兗州，民國17年5月13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4。

<sup>69</sup> 民國17年5月15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357。

<sup>70</sup> 民國17年5月13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339-340。「蔣中正致馮玉祥閻錫山元申電」（兗州，民國17年5月13日），〈革命文獻—16會攻魯冀〉，《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19/103。

<sup>71</sup> 民國17年5月14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343-344。

<sup>72</sup> 民國17年5月14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350。

<sup>73</sup> 民國17年5月12日條，《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17年（1928）1至6月份》，頁825-826。

<sup>74</sup> 「蔡元培、張人傑、黃郛致蔣中正元電」（上海，民國17年5月13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5。

<sup>75</sup> 李國祁：〈北伐後期的政略〉，《民國史論集》，頁516。

協議參加北伐時，廣州中央即有默契許馮玉祥入北京。<sup>76</sup>在二期北伐的戰略，曾一度是由閻負責京漢線，而由馮負責津浦線；濟案後仍由馮玉祥取北京。但現在日本公開表明反對馮取京津，而要蔣去向馮說將攻取京津任務交給閻錫山，實很難對馮開口。5月15日蔣電譚延闓：「勸馮將京津責任交閻一節，由中去電似不甚妥，擬請由政府直接電商，或由熊哲明（斌）轉達。」<sup>77</sup>馮玉祥覆電回應：「我軍以免除各種困難起見，不宜直逼京津，須先求立於不敗之地，直拊北京之背。」蔣認為馮「已能覺悟，有見地」。最後處置奉方計畫，蔣決不能照馮的主張辦理，但須與他面商溝通，乃親赴新鄉與之商量，尤其要打消馮南撤的意圖，力催其北進，同時電囑李宗仁率第四集團軍急進河北。<sup>78</sup>

即在此刻，日本政府5月18日以重要覺書分致南北政府，由駐滬總領事矢田七太郎面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黃郛，以維持滿蒙治安為名，阻止革命軍在京津作戰並追擊奉軍出關。<sup>79</sup>日本傳達對京津軍事行動干涉的意圖。

面對新的情勢，蔣中正於5月19日下午在鄭州召開會議，馮玉祥新鄉來會，白崇禧亦自漢口到鄭，決定會師京津總攻擊方策，京漢與津浦各軍限期集結主力，準備進攻；京漢線上第三集團軍維持現狀；白崇禧率第四集團軍作戰部隊即到正定附近集結。<sup>80</sup>蔣並以30萬元託馮購二十日10萬人糧食，接濟各軍。<sup>81</sup>

<sup>76</sup> 譚延闓告蔣中正：「煥章入京，暫維現狀，以待政府之決定。」「譚延闓函蔣中正政治會議決定推馮玉祥為國民政府委員」（民國15年8月20日），〈革命文獻—07進占武漢〉，《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07/4。

<sup>77</sup> 民國17年5月15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350-351。「蔣中正致譚主席延闓黃部長郭刪電」（徐州，民國17年5月15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5。

<sup>78</sup> 民國17年5月18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374-375。

<sup>79</sup> 「王正廷自上海呈蔣總司令報告日政府節略已面交黃郛部長及日總領事矢田口頭聲明電」（民國17年5月18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1）》，頁198。

<sup>80</sup> 民國17年5月19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380。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2冊，頁462。

<sup>81</sup> 「蔣中正電朱培德抵鄭州與馮玉祥商作戰計畫並辦理托馮所購糧食運配」（民國17年

鄭州會議上另一個重要議題，是馮玉祥提議更換外交部長黃郛。<sup>82</sup>蔣中正對黃郛處理南京事件之寧案，已有不滿之意，他認為黃郛「以為英人狡猾，而吾人太實，其意近於輕視國人，此無知自薄心理，豈能勝任外交部長」？又批評：「膺白外交自暴弱點，此乃中國人妄自菲薄之根性也。」<sup>83</sup>這時日本欲增兵京津，在此外交嚴峻時刻，外長應易以與英美較有聯絡者，馮玉祥認為王正廷為最合適的人選。<sup>84</sup>

黃郛在攝政內閣延王正廷入閣，王和馮玉祥的政治關係自此開始。王正廷雖和蔣中正為浙江奉化同鄉，但並無何淵源。1927年寧漢分裂時，馮玉祥勢力進入中原，需要有人為蔣、馮間居中聯絡，黃郛任上海特別市市長，無法分身，以王正廷為合適的人選，經黃郛的安排和介紹，蔣聘為總部的顧問，派至馮玉祥處，為王正廷與蔣馮關係的由來。<sup>85</sup>再則，1925年王正廷出任中俄會議督辦時，孔祥熙為會辦，對孔有提攜之情。當孔祥熙回到上海調停蔣中正和汪兆銘的矛盾時，王正廷成為孔府的座上賓。時蔣中正熱烈追求宋美齡，更需要孔氏夫婦的協助，王正廷也水漲船高。<sup>86</sup>

蔣為對馮玉祥有所交待，親電黃郛請速辭外交部長職，改任外交委員會主席，又恐黃誤會，勸說：「吾輩作事完全以黨國為前提，個人名義諒不在計中。」<sup>87</sup>黃郛接電即於22日辭本兼各職，<sup>88</sup>蔣為免外人猜測，請張人傑慰留，也望黃諒解其間的難處：「一切以有利於國為主，絕無意

5月20日），〈籌筆—北伐時期〉，《蔣檔》，檔號：2010.10/4450.01-0013/19。

<sup>82</sup> 民國17年5月20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382。

<sup>83</sup> 民國17年3月22日，王宇高、王宇正同編：《困勉記》，卷9，頁3-4。

<sup>84</sup> 「國民政府委員會第66次會議速記錄」（民國17年5月25日），〈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速記錄〉，第7卷，《國民政府檔案》，檔號：0461/6077.03-07。

<sup>85</sup> 沈亦雲：《亦雲回憶》，上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60年2月），頁276。

<sup>86</sup> 石源華主編：《王正廷傳》（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頁184-185。

<sup>87</sup> 民國17年5月20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383-384。

<sup>88</sup> 沈雲龍編註：《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上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65年1月），頁355。

氣，弟信兄必如是也。」<sup>89</sup>張人傑甚反對王正廷任外交部長，蔣感歎道：「余之苦衷，靜公乃不知也。」<sup>90</sup>在外交部長的人事異動，蔣尊重馮的意見，不惜換下黃郛。

對日本政府覺書及說明書的答覆，馮玉祥向蔣中正建議訴諸國際的支持，將日本覺書公布，把日本以暴力侵占華北的野心公諸於世，要求世界各國，特別是美國主持正義。至於革命軍的因應之道，只能攻取京津，將奉軍驅至關外，一面在外交軍事兩方面竭力準備，對關外之敵予以「殲滅」。馮雖也同意和平接收京津，他表示：「如能因政治的運用，不血刃而入京津，兄實朝夕祈禱，與政府及百川諸公之意見完全一致」，但顧慮奉張的「狡獪」，假言「和平退出」，實為「緩兵之計」，「如此則百川上當，全局皆非」。馮主張仍應儘速催第四集團軍依令集結，全線猛攻，將奉軍驅出京津。<sup>91</sup>南京當局則已先一日對日本覺書答覆如下：「我國連年用兵，惟期國家之統一，政治之改良，若張作霖能及時下野，奉軍能自動退出京津，移駐關外，則全國統一，自不必繼續用兵，奉軍退卻之時，更何須追擊。惟盼奉軍於最短期間行之也。」<sup>92</sup>張作霖自動出關，和平統一京津，是南京中央的決定，馮玉祥則不放棄採取武力。

## 伍、道口、柳衛之會與京津接收問題

由於日本對京津有干預的態勢，甚至表示如馮進京津，將以武力對之。而馮玉祥曾受第三國際指導，北京外交團視馮有共產色彩的疑慮，故

<sup>89</sup> 民國17年5月24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410-411。「蔣中正電張人傑慰留黃郛辭職任王正廷為外委會主席以對馮玉祥交待」（民國17年5月24日），〈籌筆—北伐時期〉，《蔣檔》，檔號：2010.10/4450.01-0013/43。

<sup>90</sup> 民國17年6月4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478。

<sup>91</sup> 「馮玉祥呈蔣中正敬電」（新鄉，民國17年5月24日），〈特交文電—領袖事功之部：壹、領導北伐統一—掃除軍閥主持奉安大典〉（9冊之9），《蔣檔》。

<sup>92</sup> 民國17年5月23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400-401。

第一、第二、第四集團軍到北京，外交團均不甚贊成，惟希望由第三集團軍進入京津。<sup>93</sup>閻錫山原本和奉軍恩怨不深，不若馮玉祥視奉張為死敵，由閻錫山接收京津奉張比較能接受。<sup>94</sup>事實上，奉方已和第三集團軍駐天津代表南桂馨接洽退兵辦法，也派直隸省長孫世偉南下，商議和平解決方針，所顧慮者為馮玉祥的態度。<sup>95</sup>

蔣中正和南京中央都一致主張由晉閻和平接收京津，馮玉祥對奉的態度是否能和南京一致，關係北伐最後的成敗，蔣中正和南京中央都小心應對，對馮曉以大義。從鄭州回來，蔣電謝馮之餘，透露晉閻轉來奉方訊息：「如晉軍能和平接收京津，則奉軍可退出關外，一致對外。」<sup>96</sup>也轉告日方對京津地區作戰干預的可能，及阻止北伐軍出關的積極表示。<sup>97</sup>蔣同時希望馮能開誠表示同意政府將京津交付晉閻接收之處置，蔣對馮言：

我方如對京津力戰，日必強加干涉，且敵不悉我軍團結內容，日伺我軍互爭京津之時，為其蹈隙反攻之機。故此時如兄有贊成百川接收京津之表示，並聽政府之處置，使敵無離間之策，且得加我內部之團結。<sup>98</sup>

蔣進而向南京中央明確主張「如奉軍能於一星期內全部出關，先有表示和平之誠意，則我政府亦可令各軍在關內停止追擊，然後進行和平方法」。各方趨於一致的意見，惟馮或不贊成，蔣建議南京中央堅決主張，

<sup>93</sup> 「上海張天樞尚密寒由申電」（民國17年5月20日到）、「天津南桂馨績沃密艷午二電」（民國17年6月1日到），〈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北伐接收京津案〉，《閻錫山檔案》（以下簡稱《閻檔》），國史館藏（以下省略），檔號：0372.42/1123.11。

<sup>94</sup> 李國祁：〈北伐後期的政略〉，《民國史論集》，頁518。

<sup>95</sup> 劉維開：〈北伐收復京津之役〉，《近代中國》，第54期（民國75年8月），頁54。

<sup>96</sup> 「蔣中正致馮玉祥養電」（徐州，民國17年5月22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13。

<sup>97</sup> 「蔣總司令致馮玉祥總司令告以日政府照會對我軍在京津作戰時或將強加干涉電」（民國17年5月22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1）》，頁200。

<sup>98</sup> 「蔣中正致馮玉祥養電」（徐州，民國17年5月22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18。

或可改變馮的意見。<sup>99</sup>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即電覆同意「奉軍退出關外，京津由晉和平接收」，並指示由蔣主持，即電閻錫山進行。<sup>100</sup>譚延闓另以急電向馮玉祥勸說：

京津作戰於外人方面不無顧慮，若能以政治手段收復京津，對奉雖有養癰貽患之慮，對外實有釜底抽薪之效。京津既下，外交統一，運用較多，第二步奠定遼瀋，未為不可。我國對日非立十年刻苦大計無生存望，目前應付似宜與時變通。<sup>101</sup>

日本干預國民革命軍進入京津，蔣中正私下以為奉張尚能對日本野心有所覺悟，馮玉祥卻見不及此，「必欲根除奉張，無異促日本早取東省」。蔣以為中國國本未固，國力不及的情況下，對日不宜輕啓戰禍，惟有以「忍辱負重之心與之交涉」換取「準備時間」。<sup>102</sup>其後九一八終究未能阻止日軍對東北的侵略，忍辱交涉以換取準備時間，七七事變之前一直是蔣對日政策的基調。

蔣中正5月22日一日三電馮探詢對晉閻接收京津的反應，<sup>103</sup>馮玉祥不得不覆蔣表示贊成奉軍出關，不戰而下北京，但有附帶兩點注意事項：一、須防奉軍受日人挑撥，分散我方勢力。二、須防奉軍退出關外，藉外力死灰復燃。<sup>104</sup>然對閻錫山接收京津一點未正面回應，馮甚至經由李烈鈞

<sup>99</sup> 「蔣中正致譚主席延闓養中電」（徐州，民國17年5月22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15。民國17年5月22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393、395-396。

<sup>100</sup> 「譚延闓致蔣中正養未電」（南京，民國17年5月22日）、「蔣中正致閻錫山養亥電」（徐州，民國17年5月22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17。「南京趙芷青密夜（22日）電」（民國17年5月25日到），〈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北伐接收京津案〉，《閻檔》，檔號：0372.42/1123.11。

<sup>101</sup> 「譚延闓致蔣中正轉馮玉祥養中電」（南京，民國17年5月22日），〈特交文電：壹、領導北伐統一—掃除軍閥主持奉安大典〉（9冊之4），《蔣檔》。

<sup>102</sup> 民國17年5月22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397-398。

<sup>103</sup> 陶英惠輯註：〈蔣馮書簡新編〉（4），《傳記文學》，74卷5期（民國88年5月），頁128。

<sup>104</sup> 「馮玉祥呈蔣總司令漾電」（新鄉，民國17年5月23日），〈革命文獻—03第二期敵情概況與我軍戰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17/27。

表達「協助進行」閻接收京津之意。<sup>105</sup>

就在同時，馮令韓復榘部南撤，讓閻錫山在完縣孤軍獨戰，集結晉縣奉軍占領博野、安國，有向定縣迂迴之企圖，戰況又趨危急。蔣一方面電勉閻「紓懷堅忍」，其言：「決不使吾兄獨任其難，弟必盡其責以共赴之也。」<sup>106</sup>一方面電馮部從速向清苑前進，鞏固陣線，至少亦要牽制奉軍，以挽第三集團軍危局。<sup>107</sup>在北伐勝利即將到來的前刻，蔣認為「煥章心懷叵測，百川膽小情怯，而德鄰、健生又意存觀望」。<sup>108</sup>蔣中正對馮玉祥的不信任感，牽動以後的兩人關係。

當此關鍵時刻，馮、閻請蔣中正進駐新鄉指揮，但蔣考慮到對日交涉還在急迫中，不能遠離南京，前方事仍請馮主持一切，特別強調：「軍事時期尤在革命戰線上，以不帶絲毫客氣，於事乃能有濟也。」<sup>109</sup>蔣並電告閻錫山，第二集團軍攻取高陽，第三集團軍攻取保定，二路同時並進，請閻部如期進取，「勿使第二集團軍稍有猶豫之意」，並「堅其決心」。<sup>110</sup>蔣中正並以實際行動支持馮部，以餉款而言，未敢怠慢，5月14日要求宋子文對馮部前欠領之款項，以中央鈔票5元、10元者償之，並交熊斌轉給馮玉祥中央票50萬元為特別費；<sup>111</sup>17日南京發第二集團軍5萬元；18日又在徐州發50萬元，第二集團軍總參議熊斌表示在徐州所發之50萬元係代蔣購辦糧食，並辦經常協濟之款，仍應再領25萬元，得蔣之同意陸續籌撥。<sup>112</sup>

<sup>105</sup> 簡筌簧：〈晉綏軍與國民革命軍北伐〉，頁239。

<sup>106</sup> 民國17年5月23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401-403。

<sup>107</sup> 民國17年5月23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402。

<sup>108</sup> 民國17年5月23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404。

<sup>109</sup> 「蔣中正致馮玉祥有亥電」（徐州，民國17年5月25日），〈革命文獻—03第二期敵情概況與我軍戰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17/100。

<sup>110</sup> 「蔣中正致閻錫山有亥電」（徐州，民國17年5月25日），〈革命文獻—03第二期敵情概況與我軍戰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17/101。

<sup>111</sup> 「蔣中正電飭宋子文速償還前欠領之款並發給馮玉祥特別費五十萬元」（民國17年5月14日），〈籌筆—北伐時期〉，《蔣檔》，檔號：2010.10/4450.01-0013/8。

<sup>112</sup> 「劉紀文致蔣中正宥電」（民國17年5月26日），〈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檔》，光碟檔號：080200，033卷，編號：08B-02330。

5月29日，蔣親赴新鄉，與馮玉祥會於道口，蔣勉馮玉祥「堅志毅力，急起直追，義無返顧，事勿猶豫」。<sup>113</sup>馮對占領京津時之處置及有關外僑之安全問題，和蔣取得一致的看法。京津問題，決定天津方面，革命軍進至靜海止；北京方面，進至長辛店止，京津鐵路沿線亦即以此兩地為準，二十里以內均不進兵。由政府照會各國，說明革命軍為求外僑安全起見，當竭力避免在京津及其附近地域作戰，決定不進兵至二十里以內各地方。但奉軍亦不得再在京津停留；各國亦應表達不偏袒何方，不干涉內政之誠意。<sup>114</sup>道口會面的主要目的是「雪恥在團結內部，消除意見」，<sup>115</sup>對占領京津的處理方案，蔣採納了馮的主張。

蔣、馮這次會晤，據馮玉祥的記述，兩人「談話很多」，蔣曾問馮對軍區問題的意見，馮大略表示，以為中國幅員廣大，最好劃作幾個軍區，較為適合，但每個軍區又不可太大，明清以兩省為一軍區單位，民國以來每個軍區不過五省。<sup>116</sup>

蔣與馮玉祥會後，5月30日晚到石家莊，閻錫山迎見，報告第三集團軍占領滿地，距保定十餘里。這次蔣、閻會晤，應該是第一次見面，蔣對閻的反應很好，他說：「百川為老成深沉之友也，吾更當以光風霽月之誠心待之。」<sup>117</sup>翌日，蔣閻繼暢談2小時，蔣稱許閻之言「能識大體」。<sup>118</sup>由於個別和馮、閻接觸，更瞭解到隱憂難解，即未來直隸政治的安排，馮和閻或不能相得，民國以來中國之亂局皆由京津的爭奪而起，蔣為此內心非常焦慮，必得「因勢利導」，促使二人「精誠團結」，方能「準備一致

<sup>113</sup> 民國17年5月29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443。據馮日記，兩人談話4小時40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2冊，頁462。

<sup>114</sup> 「蔣中正致譚主席延閻陷電」（新鄉，民國17年5月30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20。民國17年5月30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454。

<sup>115</sup> 民國17年5月29日條，王宇高、王宇正同編：《困勉記》，卷9，頁15。

<sup>116</sup> 馮玉祥：《我的生活》，頁604。

<sup>117</sup> 民國17年5月30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457。

<sup>118</sup> 民國17年5月31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461。

雪恥」。<sup>119</sup>即在京津克復前夕，蔣因中央電催回京，臨行前再與閻錫山商談軍事、外交、政治各事。蔣稱閻氏所言為「知己之談也」，<sup>120</sup>兩人相當投機，見解也相近。

蔣中正因急於南行，馮、閻對京津接收互不相讓，然閻事實上已取得先機，蔣必須要勸退馮，乃再邀馮到新鄉面敘。<sup>121</sup>6月2日蔣至新鄉候馮未至，赴徐州途中轉車往道口，馮又不在，直到柳衛車站始與馮相見。<sup>122</sup>蔣擬將河北省並北京交給閻負責，徵詢馮的意見，馮表示：「只要軍閥國賊鏟除淨盡了，我便已經十分滿足，別的事怎麼辦都可以。」蔣又請馮駐軍天津，馮以為革命告一段落，政治應使之真正統一，大家都當解除兵權，交歸中央，不可仍舊各霸一方，形成割據之局。閻部駐河北，馮部駐津，部屬之間恐不易處得好，因此覺得不合適。<sup>123</sup>

馮玉祥當時同意滄州攻下，即赴石家莊或保定與閻錫山會晤。蔣認為馮能和閻會面，可建立彼此互信。同時指示派駐在晉的代表方本仁要盡力促使馮、閻二人互信；甚至叮嚀馮來晤時，並請閻能對馮酌濟款項則更好。<sup>124</sup>這次蔣、馮會晤，蔣認為「討論圓滿」，以為馮能「以公忘私」，對公私兩方都是福。<sup>125</sup>馮玉祥隨後回電表示：「兩次晤談，快願平生，前方軍事進展甚速，京津指日可下，對於直隸京兆政治問題，自應先事布

<sup>119</sup> 民國17年5月31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462。民國17年5月31日條，王宇高、王宇正同編：《困勉記》，卷9，頁15。

<sup>120</sup> 民國17年6月1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468。

<sup>121</sup> 簡筌簧：〈晉綏軍與國民革命軍北伐〉，頁239-240。

<sup>122</sup> 民國17年6月2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470-471。

<sup>123</sup> 馮玉祥：《我的生活》，記兩人詳談二、三小時，頁604-605。據馮日記「11點，迎蔣於柳衛車站，談話至12點半而別」，兩人談話一個半小時。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2冊，頁462。

<sup>124</sup> 「蔣中正致方本仁江電」（徐州，民國17年6月3日），〈革命文獻—16會攻魯冀〉，《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19/150。民國17年6月3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472-473。

<sup>125</sup> 民國17年6月2、3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471、473。

<sup>126</sup> 「馮玉祥呈蔣中正冬中電」（民國17年6月2日），〈特交文電—領袖事功之部：壹、領導北伐統一—掃除軍閥主持奉安大典〉（9冊之9），《蔣檔》。

置，惟兄無絲毫或詢一，唯我弟之命令是從。」<sup>126</sup>馮玉祥不僅電蔣表示其部是「為革命而犧牲，為統一而作戰，非為爭地盤而革命也」。<sup>127</sup>馮更召集總部各級將領訓話：「諸位由五原到豫，萬苦千辛，至今仍不能養老育幼，萬分抱愧。去冬，吾請蔣總司令復職，今又請閻總司令在北京主持一切，是為國家計，為人民計，非為地盤計也。望告所屬，免生誤會。」<sup>128</sup>然河北省並北京交由閻錫山主持，馮玉祥很難向其部下交代。

蔣為維持馮、閻兩人互信團結，一到徐州即電馮玉祥務與閻錫山面商一切，並建議由馮來推薦閻為北京衛戍司令，將人情作給馮，以顯示：「吾人之能互信而禮讓也。」<sup>129</sup>蔣調和馮、閻之間，私下以為：「精誠團結，捨私全公，吾必力為導之。」<sup>130</sup>然不幸最後還是在互信基礎上出問題。

## 陸、鄭州復會與漸行漸遠

5月的鄭州會議後，蔣中正25日策定北伐軍總攻擊部署，28日各集團軍正式向平、津發動總攻擊。第三集團軍30日進占保定，第二集團軍31日克高陽，第一集團軍6月2日下滄州。張作霖見大勢已去，於6月2日下令總退卻，出關返奉，4日晨日軍炸於瀋陽皇姑屯，傷重去世。

北京政局急轉直下，南京中央即於4日發表閻錫山為京津衛戍總司令。蔣中正不放棄任何調和馮、閻的機會，4日電促閻速就北京衛戍司令職，並請閻推薦馮玉祥為前敵總司令，以為團結之本，附語「但此全視百兄之意而定」，又表現對閻的尊重。<sup>131</sup>閻錫山隨即表示勉為其難接受任

<sup>127</sup> 民國17年6月2日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2冊，頁468。

<sup>128</sup> 民國17年6月3日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2冊，頁468-469。

<sup>129</sup> 「蔣中正致馮玉祥江午電」（徐州，民國17年6月3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26，頁55。民國17年6月3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473。

<sup>130</sup> 民國17年6月3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474。

<sup>131</sup> 「蔣中正致閻錫山轉方本仁支電」（南京，民國17年6月4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29。

命，對馮的任命亦無異議。<sup>132</sup>馮卻認為閻出任北京衛戍司令職是長才短用，4日另行保薦白崇禧來出任。<sup>133</sup>至於和閻會面的時間，則推待陝事平定後，實有意推拖。馮玉祥保薦白崇禧，事先既未徵得白的同意，也未和蔣或南京直接商量，難免引起困擾，徒增外界的揣測與誤會。<sup>134</sup>迫使白崇禧不得不表示：「只隨閻總司令到京一行，決不擔任任何名義。」<sup>135</sup>

閻錫山6月6日在太原行營就任京津衛戍司令，外交團發表聲明歡迎。<sup>136</sup>6日下午當晉軍徐永昌部抵達北京城外盧溝橋附近時，馮軍韓復榘部亦到達南苑，兩軍互爭入城。<sup>137</sup>國民軍五原誓師，自甘肅轉戰千里，目標就是北京，現到達北京城外，不僅外交團反對，蔣和南京中央也不支持，硬生生被阻於北京城外，拱手讓予晉閻，對馮玉祥而言，的確是一件令人扼腕的事。

京津底定在即，蔣再促馮玉祥早與閻會面，以便從速解決一切，並請馮保薦北京市長一人。<sup>138</sup>6月7日，蔣以政府已發表閻為京津衛戍司令，

<sup>132</sup> 「方本仁呈蔣中正歌電」（民國17年6月5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29。

<sup>133</sup> 「馮玉祥呈蔣中正支電」（道口，民國17年6月4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27。

<sup>134</sup> 「蔣中正致李宗仁白崇禧虞辰電」（南京，民國17年6月7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38。

<sup>135</sup> 「劉棫南京灰電」（民國17年6月10日），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3）—民國17年至民國19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7年9月），頁992-993。

<sup>136</sup> 「閻錫山呈蔣中正魚電」（太原，民國17年6月6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30。〈孔繁蔚呈蔣總司令魚戍電〉（北京，民國17年6月6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36。

<sup>137</sup> 「方本仁呈蔣中正齊電」（保定，民國17年6月8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47。林貞惠：〈馮玉祥與北伐前後的中國政局（民國13年-17年）〉，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69年5月，頁231。

<sup>138</sup> 「蔣中正致馮玉祥魚電」（南京，民國17年6月6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33。民國17年6月6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482-483。

回拒馮推薦白崇禧的建議，再請馮早日與閻見面，不要藉故推拖，一切應以適宜救國為主。<sup>139</sup>是日下午，蔣得到馮軍擅入天津的消息，引發緊張的情勢，即電馮玉祥以大局為重，即令前線部隊「遵照原命令辦理，勿遽入津，免生糾紛」。<sup>140</sup>馮玉祥雖於同日晚7時通令韓部不准越過南苑一步，京津事務已電請閻前往主持。<sup>141</sup>然蔣復聞鹿鍾麟所部約6萬人駐南苑，並有入北京之意。<sup>142</sup>蔣對馮的舉動深不以為然，一面電催閻從速入京主持，實行職權，先前推馮為前敵總司令事也作罷。<sup>143</sup>一面則質問馮滯留北方，不即北上晤閻，啓外人猜測，亦對軍事不利。原希望請閻專理京津秩序，前方各軍歸馮統一指揮，現馮遲不至，只有暫推閻指揮，以團結軍心。<sup>144</sup>

當張作霖撤出北京之初，蔣原意以第一、第二集團軍編為右翼軍，第三、第四集團軍編為左翼軍，由馮、閻率領，徵詢馮的意見。<sup>145</sup>馮玉祥另有主張。<sup>146</sup>6月8日第三集團軍前敵總指揮商震部張蔭梧軍入北京，閻錫山在保定就京津衛戍司令職。奉軍鮑毓麟旅退出至通州附近，為第二集團

- <sup>139</sup> 「蔣中正致馮玉祥虞電」（南京，民國17年6月7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37。民國17年6月7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487。
- <sup>140</sup> 「蔣中正致馮玉祥虞電」（民國17年6月7日），〈特交檔案—一般資料〉，第34冊（民國17年6月），《蔣檔》。民國17年6月7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487-488。
- <sup>141</sup> 民國17年6月7日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2冊，頁470。
- <sup>142</sup> 「蔣中正致馮玉祥庚電」（民國17年6月8日），〈特交檔案—一般資料〉，第34冊（民國17年6月），《蔣檔》。
- <sup>143</sup> 「蔣中正致方本仁佳辰電」（南京，民國17年6月9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48。
- <sup>144</sup> 「蔣中正致馮玉祥庚午電」（南京，民國17年6月8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44。
- <sup>145</sup> 「蔣中正致馮玉祥閻錫山支辰電」（南京，民國17年6月4日），〈革命文獻—16會攻魯冀〉，《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19/153。
- <sup>146</sup> 馮玉祥主張：一、以一、二、三、四集團軍歸一人節制；二、以一、二集團軍歸一人節制，三、四集團軍歸一人節制；三、以在前方各軍歸一人負責指揮，以一人或二人為副總。〈蔣作賓呈蔣中正蒸電〉（道口，民國17年6月10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53。

軍所阻折回，被韓復榘繳械。<sup>147</sup>

韓復榘既入南苑，蔣中正電馮制止，勿再令入北京城，韓部在原地整頓，歸閻指揮。<sup>148</sup>蔣要盡力消弭馮部引起的內部糾紛，即命令朱培德指揮的第一集團軍亦在現地停止，整頓待命，勿再北進，免給馮玉祥口實。馮搶在閻錫山入北京前的各種舉動，如「派韓部等擅入南苑，並命入北京城，不聽閻之指揮，使其不能行使衛戍職權」，蔣認為馮「各種舉動多為中外人士所不宜」。<sup>149</sup>蔣甚至以「爭權奪利之私心，誠敗事殺身之利刃」的重話，批評馮「利令智昏，已入迷途」。<sup>150</sup>

蔣中正有感於馮、閻、白之間難於和衷共濟，並為實踐功成身退的前言，毅然於6月9日宣布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及軍事委員會主席，俾軍政統歸軍事委員會。<sup>151</sup>其後有深一層的用意，即作為軍事將領的示範，希望自己的行動能如「君子之德風」，或有人會追隨其後。<sup>152</sup>蔣同時也決定前方軍事布置，馮未到前方以前，應歸閻統一指揮；迨馮到後，則閻坐鎮京津，鞏固後方，而以各軍概歸馮統一指揮。<sup>153</sup>蔣委閻以重任，特別請和馮之間「事事推誠」，蔣語重心長的表示：「立國雪恥之方，惟有團結，同志消除私見，共赴國難。」<sup>154</sup>馮玉祥也對內部告誡：「我軍不爭權利，為國拚命及同蔣、閻、李精誠團結，謀中國之和平統一，實為吾人之

<sup>147</sup> 郭廷以編：《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2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3年4月），頁357-358。

<sup>148</sup> 「蔣中正致馮玉祥佳辰電」（南京，民國17年6月9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49。

<sup>149</sup> 「蔣中正致朱培德佳辰電」（南京，民國17年6月9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50。

<sup>150</sup> 民國17年6月9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493-494。

<sup>151</sup> 李國祁：〈北伐後期的政略〉，《民國史論集》，頁520-521。

<sup>152</sup> 民國17年6月9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494。

<sup>153</sup> 「蔣中正致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朱培德白崇禧灰電」（南京，民國17年6月10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52。

<sup>154</sup> 民國17年6月11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502。

原來目的。」<sup>155</sup>不論是蔣或馮，都有要「團結」的共識，但事實表現出來的行動卻非然。韓復榘將鮑旅繳械的行爲，不僅破壞團結，更引發外交團的緊張。北伐大業甫告完成，內部已有分裂現象，馮、閻、白三人之間調處，使之推誠團結，是蔣面臨棘手的問題之一。<sup>156</sup>

閻錫山於6月11日偕白崇禧入北京；12日天津和平收復，直魯軍撤退，傅作義就警備司令，接管天津防務。<sup>157</sup>撤退的直魯軍退往山海關，還有最後的軍事行動，蔣中正策劃以一、二集團軍爲右翼，馮爲右翼總司令，擔任攻克山海關；以三、四集團軍爲左翼，閻爲左翼總司令，擔任攻克熱河，並以馮爲全軍前敵總指揮。但馮以「責任太重」拒絕這項任務。<sup>158</sup>

由於蔣與馮、閻之間有許多事待商，決定派和兩方都有交情的孔祥熙爲代表，北上和馮、閻共籌大計。<sup>159</sup>孔祥熙和馮玉祥6月18日在新鄉會談4小時，馮對裁兵問題提出意見，他認爲「應以軍隊之良否爲裁編之標準，久戰官兵，歷盡艱辛，不獎勵尚可，若再裁撤，問心實覺未安，何況他方正在招兵」。<sup>160</sup>孔向蔣回報馮誓擁護中央，服從領導，完成革命。但希望中央對於軍政、財政、吏治須有切實主張，萬不可效軍閥之分贓。<sup>161</sup>儘管孔祥熙表示會談圓滿，但似乎也透露馮對南京中央裁兵問題已有不滿的訊息。

<sup>155</sup> 民國17年6月12日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2冊，頁471。

<sup>156</sup> 內部問題，另有汪兆銘和胡漢民二人，張人傑、孫科和宋子文三人之間的不合。民國17年6月11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503。

<sup>157</sup> 「閻錫山呈蔣中正文電」（北京，民國17年6月12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64。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3）—民國17年至民國19年》，頁993-994。

<sup>158</sup> 「蔣中正致馮玉祥元電」（鎮江，民國17年6月13日）、「馮玉祥致蔣中正刪申電」（新鄉，民國17年6月15日），〈革命文獻—16會攻魯冀〉，《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19/157。

<sup>159</sup> 民國17年6月14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513-514。

<sup>160</sup> 民國17年6月18日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2冊，頁475。

<sup>161</sup> 「孔祥熙呈蔣中正巧電」（新鄉，民國17年6月18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81。「馮玉祥呈蔣中正巧電」（新鄉，民國17年6月18日），〈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蔣檔》，檔號：2020.10/4450.01-021/82。

馮玉祥和孔祥熙談話後，馬伯援偕日本記者來訪，針對馮、閻意見不合的傳言，馮表示是日本報紙造謠；對京津的意見，馮表示：「京津完全由閻總司令負責，余聽命中央，誠心推閻辦理。」<sup>162</sup>正由於外界對馮有質疑，馮一再需要表態支持閻。馮的確是在聽到張作霖被炸死的消息後，就大病一場，<sup>163</sup>而不是故意稱病，但正好是北伐軍接收京津關鍵的一星期，外界的解讀是馮始終不願先行赴北京晤閻。

京津底定，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派蔣中正赴北平<sup>164</sup>祭告總理孫中山並視察一切。<sup>165</sup>蔣中正6月26日啓程北上，7月1日凌晨2時抵鄭州，馮玉祥來迎，見馮「面目瘦黑，精神不佳」，一同出席鄭州各團體歡迎大會，會後兩人密談，馮表示不願同上北平之意，蔣亦不便勉強，上午10時與馮話別。蔣會後認爲馮爲人缺少「霽月光風襟度」。<sup>166</sup>蔣邀馮同行被拒，透露馮的不滿，蔣心裡也有不快。2日，蔣再電催馮北上，盼以行動表現團結，避免啓外人猜疑口實。<sup>167</sup>這次的會晤，馮對蔣不復如年初的熱絡，甚至拒與同行，兩人交誼隱然生變。

當蔣、閻、李三集團軍總司令皆到北平，馮玉祥卻一直稱病，終於7月4日到保定，如期趕上6日中樞在北平西山碧雲寺舉行的祭告典禮，蔣「心稍爲慰」，並爲四個集團軍總司令北伐後在北平第一次的集會。北平政治分會同時成立。傍晚，蔣中正和馮玉祥、閻錫山共商時局，蔣告之：

<sup>162</sup> 民國17年6月18日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2冊，頁476-478。「答日本記者問」（民國17年6月18日），馮玉祥選集編輯委員會：《馮玉祥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頁67。

<sup>163</sup> 馮玉祥：《我的生活》，頁753。

<sup>164</sup> 1928年6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145次政治會議，決議直隸省改爲河北省，北京改名北平，北平、天津爲特別市。〈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記錄〉，《中央政治會議檔案》，黨史館藏，檔號：00.1/35。

<sup>165</sup> 民國17年6月14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516-517。

<sup>166</sup> 同行的有吳敬恆等人，是日會晤，有近8小時的時間，但蔣、馮二人的資料，都缺乏詳細內容。民國17年7月1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574、576。馮玉祥：《我的生活》，頁606-607。

<sup>167</sup> 民國17年7月2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577。

「時局已至訓政建設之日，祇要吾人和衷共濟，努力作去，一切可不用過慮也。」<sup>168</sup>「和衷共濟」的期盼即在隨後召開的湯山會議而落空，裁軍問題加深了彼此的裂痕。

北伐告成，馮、閻儼然成爲華北兩大軍事勢力，力求兩人勢力的均勢，是蔣中正安排華北政局的主要考量，不論北平臨時政治分會的委員或河北省政府的委員，都是馮、閻各占一定比例。<sup>169</sup>北平特別市長任用馮系的何其鞏，天津特別市長任用閻系的南桂馨。10月，五院制國民政府成立，蔣中正以馮爲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閻爲內政部長，人事上的安排，都具深意。

## 柒、結 論

繼1927年6月的徐州會議後，蔣中正和馮玉祥的關係日趨接近，蔣中正1928年初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馮展開新一階段的合作關係，共同進行北伐最後的軍事行動。北伐軍推進華北，要擊敗奉張，攻取北京，蔣中正需要借重馮玉祥在北方的軍事力量，甚至要結合山西閻錫山；馮、閻也清楚必須和蔣合作，方有可爲，這是蔣和馮結盟，甚至聯合閻錫山的基礎。

蔣中正在北伐期間和馮玉祥交往，實基於北伐戰略上的需要，共同的利害，而非彼此的情義。2月16日開封軍事會議，確立蔣與馮、閻合進北伐的軍事戰略，並於鄭州結金蘭之交，強化戰略合作的意義較大。4月27日蘭封會議，對黃河以北作戰計畫、山東省政府組織、津浦線指揮等問題有進一步的商定。濟南事變後，蔣、馮5月5日會於黨家莊，共商應付危局，取得對日不抵抗的共識；19日鄭州之會議定會師京津總攻擊方策，並論及外交部長的人事異動。至於京津接收的安排並取得馮對閻接收

<sup>168</sup> 民國17年7月6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591、607。

<sup>169</sup> 李國祁：〈北伐後期的政略〉，《民國史論集》，頁521。

北京的諒解，先後就商於道口和柳衛。京津底定之後，7月1日的鄭州會面，沒有慶賀北伐勝利的喜悅，兩人行色匆匆，熱絡的情誼不復，關係已漸行漸遠。

北伐期間蔣中正和馮玉祥、閻錫山的會面，蔣中正和馮玉祥於1927年6月第一次會面於徐州會議，至1928年7月6日四集團軍總司令會於北平之前，有7次的會晤；蔣和閻則只有一次。蔣和馮玉祥的互動，隨北伐愈接近成功，從親近而疏遠，由熱情而冷淡。基本上，蔣對馮有不信任感，認為他「包藏野心」、「尚權術」，「心懷叵測」，蔣曾和陳果夫、立夫論及馮玉祥，蔣直指馮「尚權術」、「鬧意氣」為性格上的缺點。<sup>170</sup>蔣中正拉攏馮玉祥的手段之一，是軍餉軍費的支持；馮玉祥也對北伐軍的後勤補給予以協助，蔣甚至向馮玉祥學習大刀隊的訓練，借重馮訓練軍隊的經驗。蔣中正對閻錫山初步的印象是「意在割據」、「膽小情怯」，石家莊第一次見面留下良好的印象，蔣認為閻見解相近，可為知己，當然也因為兩人在接收京津的問題立場是一致的。

五三濟南慘案發生後，蔣中正第一時間和馮玉祥研商，5月5日兩人在黨家莊有深入的討論，交換對日和北伐的因應之道，共同主張對日「忍耐」、「忍辱」的原則，成為五三之後對日政策的基調，而馮玉祥提出的「不抵抗主義」，不僅為蔣中正和譚延闓、張人傑、吳敬恆兗州會議採納而定為中央方針，更是九一八之後蔣中正應付日本侵略所持的重要原則。

南京中央，不論政府或黨務系統，對接收京津缺乏規劃。黨政要員將事推給蔣中正負責，蔣身負太多的要務，看不到對京津接收工作的及早安排，而是在濟南事變後，張作霖息爭之電隨即引發，是否來得太快，超出預期，總之看不到事前具體的規劃。由於馮玉祥負責京漢線的攻勢，最先應該是屬意馮接收京津，這也是馮轉戰千里的目標。然而日本製造五三慘案，打破北伐的布局，加上北京外交團的反對，京津接收轉為閻錫山，應該是導致馮和蔣心結的主因。

<sup>170</sup> 民國17年6月6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頁484。

綜觀1928年北伐後期蔣中正和馮玉祥關係的轉折，濟案是一關鍵，濟案前兩人同心完成北伐的最後任務攻取北京，濟案發生之初，對日本的態度兩人也有一致的共識；因濟案使張作霖提前結束北京的統治，蔣、馮在對奉張的政策以及京津接收的關鍵問題上發生歧見，其後馮推白崇禧為北京衛戍司令，韓復榘繳鮑旅械事件等，均致兩人的磨擦。

北伐後期可以看到馮玉祥地位重要，蔣重要的決策多與他共商，尤以北伐軍事的部署，濟案後的對日原則，外交部長的人事案上，蔣尊重馮的意見；但在對奉政策上蔣堅持和平的原則，反對馮的用武；京津衛戍司令一職，蔣也拒絕馮的推薦。蔣不僅要和馮玉祥打交道，同時要力促馮玉祥和閻錫山兩人能團結互信，發揮團結的力量，的確需要胸襟與智慧。北伐完成的最後階段，蔣中正念茲在茲的是革命陣營的「團結」，力避馮、閻勢力在京津的衝突，維持「團結」以完成北伐，內部的不合已隱然浮現，埋下以後紛爭的因子。

蔣中正和馮玉祥在北伐時期的結盟，基於消滅奉張的共同目標，北伐完成，一旦共同的目標消失，利益的分配趨使合作關係的破裂。北伐軍事接近尾聲，馮玉祥已對裁軍問題透露不滿之意，後來也終因裁軍問題，蔣中正和馮玉祥在維護國家統一和維繫個人勢力之間產生不可避免的權力衝突，終導致後來分道揚鑣。

## 徵引書目

### (一) 檔案史料

《蔣中正總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2020.10/4450.01-017，〈革命文獻—03第二期敵情概況與我軍戰略〉。

2020.10/4450.01-007，〈革命文獻—07進占武漢〉。

2020.10/4450.01-014，〈革命文獻—13寧漢分裂與北伐中挫（下）〉。

2020.10/4450.01-016，〈革命文獻—15蔣總司令復職與軍事布置〉。

2020.10/4450.01-019，〈革命文獻—16會攻魯冀〉。

2020.10/4450.01-020，〈革命文獻—17濟南事變〉。

2020.10/4450.01-021，〈革命文獻—18底定京津〉。

08B-02320，〈特交檔案—一般資料〉（民國17年1月至6月）。

2010.10/4450.01-0013，〈籌筆—北伐時期〉。

〈特交文電—領袖事功之部：壹、領導北伐統一—掃除軍閥主持奉安大典〉。

王宇高、王宇正同編，《困勉記》。

《閻錫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0372.42/1123.11，〈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北伐接收京津案〉。

《國民政府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0461/6077.03，〈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速記錄〉。

《中央政治會議檔案》（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00.1/35，〈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記錄〉。

00.1/110，〈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速記錄〉。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民國16年9月至17年3月》。臺北：國史館，2003年7月。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民國17年4月至7月》。臺北：國史館，2003年12月。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1）》。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19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

## (二)年鑑、大事記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17年（1928）1至6月份》。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民國67年7月。

郭廷以編，《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2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3年4月。

## (三)文集、日記、回憶錄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1月。

沈亦雲，《亦雲回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60年2月，2版。

沈雲龍編註，《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臺北：聯經出版社，民國65年1月。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民國67年10月，未刊本。

馬伯援，《我所知道的國民軍與國民黨合作史》，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3輯，總號27冊。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74年6月。

馮玉祥，《我的生活》。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馮玉祥選集編輯委員會，《馮玉祥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

雷嘯岑，《憂患餘生之自述》。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1年10月。

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3）—民國17年至民國19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7年9月。

## (四)報紙、公報

《民國日報》，上海，民國16年12月。

《國民政府公報》，第36期（民國17年2月）。

### (五)專書

石源華主編，《王正廷傳》。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

洪喜美，《李烈鈞評傳》。臺北：國史館，民國83年6月。

雷嘯岑，《三十年動亂中國》。臺北：古楓出版社，出版時間不詳。

簡又文，《馮玉祥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1年6月。

### (六)期刊論文

李國祁，〈北伐後期的政略〉，收錄於李國祁，《民國史論集》。臺北：南天書局，民國79年2月。

林貞惠，〈馮玉祥與北伐前後的中國政局（民國13年-17年）〉，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69年5月。

張玉法，〈蔣介石對日本兩次出兵山東之反應（1927-1928）〉，「蔣中正與近代中日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2004年11月。

陶英惠輯註，〈蔣馮書簡新編〉，《傳記文學》，73卷6期（民國87年12月號）。

陶英惠輯註，〈蔣馮書簡新編〉（4），《傳記文學》，74卷5期（民國88年5月）。

劉維開，《北伐收復京津之役》，《近代中國》，第54期（民國75年8月）。

劉鳳翰，〈馮玉祥與北伐〉，《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2期（民國86年5月）。

簡筌簧，〈晉綏軍與國民革命軍北伐〉，《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2期（民國86年5月）。

